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

何绍坤,张文龙,陈兴月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阐释和中国表达。从守正向度上看,在理论内核上,守文化“化人”与“人化”的统一体、“精神生产力”、辩证唯物主义之正;在理论观点上,守文化“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之正;在方法论上,守“第一个结合”“文化批判工具”“文化遗产观”之正。从创新向度上看,在理论内核层面,创造性提出“新时代教育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六个必须坚持”;在观点层面,创造性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方法论层面,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发展路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宣传路径,“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内核、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不仅维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也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思想指南。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建设;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16;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2-0018-09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s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HE Shaokun, ZHANG Wenlong, CHEN Xingyue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represents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rooted in Chinese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t the theoretical core level, it upholds the unity of culture as "educating people" and "being shaped by people", the "spiritu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t the theoretical viewpoint level, it upholds the "class nature", "national nature" and "world nature" of culture;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it upholds the "First Integration", the "cultural criticism tool" and the "view on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innovation; at the core level, it has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the "Six Musts"; at the viewpoint level, it has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adherenc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e",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it has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the publicity path of the "all-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e practical path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s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not only preserve the authenticity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but

收稿日期:2025-06-02 网络出版日期:2025-1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24VSZ158);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XSY202501033)

作者简介:何绍坤(1998—),男,四川广元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张文龙,E-mail:253305062@qq.com

also provide a practical guide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cultural development;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innovation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基于对历史方位与战略全局的深刻把握,党中央以系统性战略思维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系建设,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逐步凝练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原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当前已有成果而言,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时代任务出发来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2],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阐释^[3]。二是从立场、观点、方法出发,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有学者认为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工作导向和文化的能动作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在继承矛盾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的基础上,又创新性地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等方法^[4]。三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列观点来阐释其新发展新贡献。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典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文化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生动地诠释了“两个结合”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具有开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思想保证、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价值引领等重要意义^[5]。还有学者认为文化价值理论、文化阶级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文化开放理论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6]。有学者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7]、“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8]、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9]等方面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此外,亦

有学者从文化领导权原理、文化主体性原理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原理等方面探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10]。当前学界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丰富发展的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分析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取得了许多共识性的研究成果,但较少从中观或者是微观方面来具体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

本文在吸收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微观视角出发,以守正和创新两个方面为切入点,进一步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守正创新的表现,揭示其如何实现理论谱系的赓续发展与原创性贡献,这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核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阐明了文化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的根本属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关于文化本质理论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教育的文化使命”和“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以先进文化的“精神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实践的人的能动活动促进人的全面解放。

(一)守文化“化人”与“人化”的统一体之正,创“新时代教育的文化使命”之新

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本质的分析与唯物史观的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以“实践的人”为逻辑引线来揭示文化的本质作用,认为人是文化的创作主体,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实践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文化作为人实践活动的产物,同样具有实践性。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1]^[5]因此,离开了人这一现实主体,文化也就失去了其本真特质。文化是“人化”的产物,但文化同时也在塑造着人自身,“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2]^[7]¹⁰文化作为人们在历史流变中不断赓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同样具有“化

人”的属性,是“人化”与“化人”的统一体。概言之,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通过文化本体论的建构,揭示了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本质规定,从而同以往的文化观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对传统观念的范式超越。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和逻辑起点。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在其发展形成的各个时期,人民性是贯穿始终的本色与底色。在贯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线脉络中,人民性既构成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属性,又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核心准则^[13],昭显了“现实的人—人民中心—人民至上”的发展脉络,守正创新地提出了“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

一方面,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来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诠释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精髓,并进一步阐明了文化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2014年至2023年,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其理论意蕴在时代嬗变中持续深化拓展,最终凝练为蕴含深刻价值内涵的新时代文化教育命题。文化与教育本质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文化创造与人的自我塑造形成同构关系,这种双向作用机制恰是“人化”与“化人”哲学命题的原初意涵。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异化的人和单向度的人”的批判,系统回答了文化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其目的就在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35}。另一方面,从文化强国与教育强国的视角审视,习近平文化思想锚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深刻阐明了文化强国与教育强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文化昌则民族立,教育强则国势兴。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习近平将二者作为有机整体统筹部署,其核心要义在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教育强国,以教育强国践行文化使命,进而共同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总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是涵摄情感认同、政治规范与信仰体系的价值表意,始终内蕴着人民至上的本真因子和根脉主线。

(二)守文化“精神生产力”之正,创“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之新

马克思在批判唯心史观谬误的过程中,创立了唯物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全然否定了意识

的能动作用,相反,马克思并未漠视文化这一关键因素。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文化提出了“精神生产力”这一新概念,并在论及劳动分工时,也明确提出了“精神劳动”的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1]178},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也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5]由此可见,恩格斯高度阐扬了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精神驱动力,在肯定优秀文化作用的基础上,擘画了其通过精神解放推动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未来图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未脱离现实的“人”这一轴心议题,而文化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精神生产力,就要锚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问题靶心。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守“精神生产力”的基础上,创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14]33}的观点。第一,习近平从大历史观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彰显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并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33},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作用规律性的认识,也凸显了文化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廓清了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回答了文化自信“从何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而指出了以“坚定文化自信”来确定“我们未来坚持走自己的路”。这种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品格,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哲学智慧。“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1],这一重要论述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高度,又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明厚度,更标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刻度。这一思想体系与强国战略构成辩证统一的“体用关系”:文化思想作为“体”,深掘文明根脉的本体价值,确立强国发展的文化根基;强国实践作为“用”,开辟文化遗产的实践路径,落实文化强国的育人使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文化思想与强国实践、文明传承与现代创新有机统一的行动框架。

(三)守“辩证唯物主义”之正,创“六个必须坚持”之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就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6]辩证唯物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以唯物辩证法为根基,以“三大规律”为依托,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对理论最好的继承就是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实践,又在新的实践中与时俱进推动新的理论创新。诚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结合了中国实际进行了创造性开拓。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系统阐发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韵味”的话语表达和话语样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一脉相承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根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继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理论伟力。譬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此,人民性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性,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14]34},文化发展要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立场,以满足人民的精神追求为根本目的。“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和守正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论的继承发展。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在实践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凝聚民族精神,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系统观的守正创新。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要时刻保持敏锐的问题意识,以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视角审视和推进各项工作,构筑主流意识形态防线,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新时代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与战略视野,它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理念的现代诠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深刻理解和生动实践。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观点的守正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守正创新提出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等重大的原创性概念,并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诸多观点的创新与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新时代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一)守文化“阶级性”之正,创“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之新

文化作为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象,本质上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表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瞻性眼光深度研判,将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巩固,锚定为攸关革命进程的根本性战略地位,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1]178}。文化由人生产,而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文化的阶级性则表现为特定阶级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文化形式,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质言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导向,会深刻影响乃至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潮流。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必须明确自己的独立性和革命性,“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12]170},必须联合起来捍卫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不仅要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争取自身权益,更要在文化领域积极宣介,解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构建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体系,以此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解放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形势,揭示文化治理通过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辩证关系实现政治势能转化的实践机制,守正创新地提出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大命题。第一,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绝对领导权,建构新时代“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政党价值统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更加印证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着眼新时代的发展大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提出“七个着力”战略要求,强调“着力加

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1],创造性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重要论断,将党对文化的绝对领导置于突出地位。党的领导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政治保证,决定的是方向性的根本问题,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性和政治性相结合,确保其始终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齐头并进,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发展阵地。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真理的力量,又运用其根本制度的威力应对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实现“建党”和“治党”的统一。思想建党存在的顽疾需制度靶向施策,制度治党面临的痼疾需开展思想工作精准破解。只有推动二者协同联动、形成合力,才能实现党的建设各要素有机衔接、综合发力,有效破解党内痼疾^[17]。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有的放矢”这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根本方法基础上,守正创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这既是党百年来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结晶,更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质的跃升。

(二)守文化“民族性”之正,创“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之新

从唯物史观的视域看,不同民族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文化,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如同血脉一样流淌在民族成员之中,呈现出典型的“民族性”特点。文化民族性作为文明存续的本体论根基,其本质是特定民族共同体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独特精神基因。每个文化体系的构建都深嵌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这既是文明形态的原生基质,又是抵御同质化危机的价值根底,这种主体性标志从存在论维度上明证了人类文明多样发展的可能路径。毛泽东在分析与审视文化民族性建设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8],这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每个民族都要赓续和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这既是民族历史传统的积淀,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发展中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守正创新提出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原创性概念。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原先“文明永恒高于四裔”的自信心态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主体性认知遭受冲击并逐渐瓦解^[19],在“以洋为尊”“唯洋是从”思潮的裹挟下,文化主体性渐渐以

“进退维谷”姿态呈现,文化自信也渐渐损伤丢失。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将中华民族失去的文化自信重新拾起来,将失去的文化主体性重新建立起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进一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更加坚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立,并通过“批判继承”和“借鉴吸收”的方法,既破除“以洋为尊”的殖民心态,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完成从“文化失语”到文化主体性回归的历史转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民族是历史范畴”论断为根基,在“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文化”向“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升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20],这是习近平对文化主体性作用所作出的深度研判,文化主体性立定了文化自信自我的根基,使文化自信有了沉潜深厚的源流与依托。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把握中华文明特质的核心范畴,历经从朦胧到澄明、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从他者参照回归自我确证的演进历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复杂语境中,所展现出的文化自觉、精神自信与主体性确立的统一。通过坚守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不断匡扶个体的政治身份认知,并以承前启后、高瞻远瞩的文化忧患意识与精神绸缪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坚实保障。习近平关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脉筋骨和实践旨归,贯穿和凝结于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理论大厦的始终,从文化层面解答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既关照了传统文化,又丰富了新的文化内涵,使中华文明基因得以赓续发展。

(三)守文化“世界性”之正,创“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新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文化的世界性特征也愈发鲜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预见到世界历史展开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历史的必然,科学界定文化兼具民族主体性与世界化属性的辩证统一,而这种世界化属性依循世界市场扩张呈现出历史哲学范畴必然的扩大趋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1]541}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社会交往扩大与文化交流深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预示了全球化背景

下文化交融的必然趋势,预见性地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1]404}。但马克思恩格斯所诠释的“世界文化”并没有消灭文化的民族性,更不是完全的文化同一化。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文化”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不仅具有世界性,也保留了自身的民族性,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两个大局”的历史坐标,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标志性概念,以中国智慧和中华文化底蕴从文明高度上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世界格局。第一,习近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进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共同体,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2]，“真正共同体”的形成需长期与“虚假的共同体”作斗争,但随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终将从狭隘的、地域的转变成为历史的、世界的人类共同体。习近平秉持唯物史观理论逻辑与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向着“真正共同体”践行中国实践、发出中国声音,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3]4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念,着眼于新时代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趋势,倡导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理念。

第二,习近平着眼于全人类发展的宏伟愿景,凝练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4]361}。“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是在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生发形成的,是世界各民族求同存异的价值结果。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并没有否定人类价值的共同性,二者是文明本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力维护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事务的权利,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纽带,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主导下“普世价值”包揽天下的垄断性诠释^[24],为创新全球文明互鉴范式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方法论的守正创新

任何科学理论的诞生都必须扎根于现实土壤,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5]。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应被视作一成不变的固定框架,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日益完善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合。

(一)守“第一个结合”之正,创“两个结合”发展路线之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的社会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背景相结合,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基于此,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并借鉴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般范式。“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方法论层面的重大创新,其强调将理论根植于中国土壤、扎根于具体实践,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又总结形成新的经验,并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要而言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探索中的一条主线。“第二个结合”也悄然孕育在“第一个结合”的胎胞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时代变局和中国时局,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创造性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原创性命题。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23]288} 质言之,“两个结合”的提出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原则。第一,“两个结合”实现了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统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3]95} 二者辩证统一于“魂脉”与“根脉”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通过实践深化彰显真理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命脉,其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文化基因。“两个结合”既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又焕发了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

第二,“两个结合”彰显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第一个结合”是跨越空间差异,将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空间轴,赋予其广阔的现实空间。“第二个结合”是贯通历史纵深,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相结合的时间轴,赋予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坚实的理论构建基点。换言之,“两个

结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回答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时代之问。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政治实践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丰富的实践基础,以一种自发、自在地形态存在,“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其显现化、规范化,而两者的契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根基,也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和指导原则。

(二)守“文化批判工具”之正,创“全媒体传播体系”宣传路径之新

劳动异化的本质在于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异化,这种普遍的异化状态必然会投射并表现在文化领域,使得文化从人的劳动创造物转变为一种疏远的,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即导致文化的异化。唯物史观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人化。但在特定条件下反客为主,使人丧失主体性,进而转变为统治和支配人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于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与质疑,认为当诗歌、艺术等精神创造沦为可量化的交换价值时,文化产品便成为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26]的商品。人的主体性均被物化关系吞噬,暴露了资本主义文化“吃人”的本质,并通过致幻人的精神世界来抹杀、消除无产阶级的反叛欲望,使人在精神世界得到满足,以致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无序现状做辩护。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始终以人的现实存在为根基,以人的解放为价值旨归,彰显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品格,并以“批判的武器”剖析了植根于“剥削性”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文化异化现象。

文化传播媒介本质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既是承载阶级统治意志的工具,也是主体解放的实践场域,这从侧面印证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1]⁴²⁰的辩证法则。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文化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23]³⁴,而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批判精神的时代化践行,蕴含人民媒体为人民的价值表意。这种新型传播范式通过重构媒介与主体的辩证关系,既延续了理论武器的批判功能,又创造性地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场域。换言之,就是将传播活动从资本异化的商品逻辑中解放,使文化生产回归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本真状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建立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

传播伦理,打破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虚假总体性”,在多元主体互动中增强无产阶级的文化自觉。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出技术媒介化、空间虚拟化、权力数据化的新特征。算法推荐机制通过“信息茧房”构建认知牢笼,使资本逻辑借由流量至上渗透至传播全链条,形成“数字拜物教”新形态。虚拟公共领域突破传统物理时空限制,在元宇宙、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去中心化的价值生产场域,但算法偏见导致的“过滤气泡”加剧群体极化,消解主流价值共识的生成基础。因此,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传播必须超越工业时代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单向灌输模式,转而构建基于数字交往理性的多元对话。要利用算法推荐激活价值议题的公共讨论,在开放互联的虚拟社群中开展批判与自我批判,实现价值共识的动态生成。这不仅延续了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传统,更是将与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延伸至虚拟公共领域^[27]。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技术赋权带来的传播权力民主化使人民群众从被规训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生产者”,实质是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解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人的解放为价值旨归的忠贞践履。

(三)守“文化遗产观”之正,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路径之新

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核深嵌于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中,当其要素通过创造性转化,被纳入生产过程的劳动资料体系或成为劳动对象时,即实现从潜在资源向现实生产力的质性跨越。生产力的存续与发展本质上依赖于代际传承与保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21]⁵⁴⁰,文化遗产与文化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文化遗产即“已经获得的生产力”^[21]⁶¹³。列宁在继承创造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文化遗产”一词,指出“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28],并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争论中提出,只有继承人类以往全部优秀文化,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篇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旗帜鲜明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并在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之路。习近平在深刻洞察文化发展演进规律中指出,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29],它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因而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资源。

其一,立足“保护好”,让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美”起来。保护好是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的首要前提,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不拆真古迹、建假古董,要在岁月沉淀中唤醒文明基因,在活态传承中彰显东方神韵,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其二,坚持“传承好”,让历史文化遗产价值“活”起来。习近平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提出“活态传承”的发展理念,“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9],运用数字技术赋能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深入挖掘其内涵与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激活以文化人的育人功能。其三,实现“利用好”,让历史文化遗产形象“立”起来。习近平强调“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29],要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与教育功能,充实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又要推动文化遗产项目开发及文旅融合,以经济收益反哺保护工作,发挥其以文载道、以文传声的作用,进一步消弭西方偏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四、结 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核、观点、方法论的守正与创新性发展呈现在众多维度。当然,本文研究阐释的三个层面仅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全貌的局部剖面,远未穷尽这一思想体系的全部理论生长点与实践创新空间。而且本文主要从微观视角出发来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因而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各方面都作出论述阐释。未来可进一步挖掘“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潜在学术增长点和拓展研究范围,来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进而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思想指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01).
- [2] 付洪, 侯耀宗.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论要[J]. 湖湘论坛, 2024, 37(6): 17-26.
- [3] 胡洋, 杨志平.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J]. 广西社会科学, 2024(5): 88-95.
- [4] 岳奎, 陈彤彤.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J]. 兰州学刊, 2024(11): 5-14.
- [5] 方世南, 黄雪梅.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8(4): 1-8.
- [6] 黄意武.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发性贡献[J]. 学习与探索, 2024(9): 26-33.
- [7] 叶本乾.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多维度彰显[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5): 44-53.
- [8] 杨洪源.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多重维度及其具体展开: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3, 27(6): 15-23.
- [9] 周建超.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 求索, 2024(4): 32-40.
- [10] 刘同舫.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J]. 学习与探索, 2025(1): 1-8.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齐红.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教育的文化使命[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3(4): 30-38.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20.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12.
- [17] 何克祥. 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J]. 理论探索, 2016(5): 41-45.
- [1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07.
- [19] 张明. 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三重逻辑: 基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三个关键词解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6): 49-59.
- [20]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4-11.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24] 王景云,黄丽. 新时代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实践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2025(5):45-52.
- [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4.
- [26]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49.
- [27] 高奇,牟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融入文化建设的四重动力系统分析[J]. 理论学刊,2017(3):17-22.
- [2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19.
- [29]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求是,2024(8):4-13.

(责任编辑:陈丽琼)